

介绍《北京现存彝族历史文献的部分书目》

王梅堂

(北京图书馆)

《北京现存彝族历史文献的部分书目》是继《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和《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刊行之后第三本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目录。由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译组刊印发行(油印本)。由于种种原因该目录只收录了北京图书馆、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学院这三个单位保存的彝文典籍,共计六百五十九部。这部分彝文典籍虽仅是卷帙浩繁的彝族文化遗产的一小部分,不能反映彝族文化的全貌,但由于收录的典籍几乎全是明清两代的手抄本和木刻本,其中还有彝族人民作为珍贵礼品献给毛主席的,所以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之是在国家民委支持下由中央民族学院组织、邀请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彝族知名经师第一次集中于北京编纂的,又是彝文有史以来第一个地区性联合目录,它的问世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彝族历史悠久,是西南众多民族中具有本民族文字的仅有的几个民族之一。彝文又称爨文、罗罗文,是历史较久的民族文字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后汉书白狼王歌”的原文为彝文的前身。最初随着羌人的南移而流行于川滇沿边一带,后来随彝族的迁徙散居,这种文字也广泛地传布开来,但彝文多是记载宗教活动的祭经,所以彝文渐成为宗教上的专用工具。

在现存的彝文文献中,为中外学者认为最早见于明代。彝文文献除部分收藏在文化教育单位外,相当部分仍保留在民间呗毫手中或他们的后代家中。这主要是由于历代封建王朝一贯推行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文化实行歧视政策,使丰富多彩的彝族文化遗

产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和研究的原因。彝族典籍主要靠呗毫世代传抄得以流传后世,所以现存彝文文献抄本多,刻本少。所见的较早木刻本是明代凤土司时雕版印行的《太上感应篇》,今存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兄弟民族语文组。

抗战时期虽有少数学者不辞劳苦,深入到彝族地区调查研究、收集彝文文献(北图现存的五百余部就是由马学良教授和万斯年先生在四三年收集到的),但社会性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取得研究成果,更不能使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服务。我们看看下边解放前在《西南边区的特种文字》一文的这段描述:“这类文字(指彝文、泰文、纳西文、苗文等)在西南边区中、流行的地区不可谓不宽广,……对边民生活文化上所发生的影响,不可谓不重大,外籍传教士能巧妙地应用之以达到传教的目的,而国人都很少知道我们版图内流行着这种文字,用这类文字编印的书籍、字典,以至刊物报纸,尽属外人所为,国人是无所知亦无所作;……国家正着手开化边民之初,此种工具是否可采取一种合理的利用,使成为开化工作的桥梁,这问题似乎也很值得研讨”

(《边政公论》1945年4卷1期)。这就清楚了解了解放前在民族同化政策压迫下,彝族语文不但得不到发展、反而行将消灭的情景。同时在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之下,对彝族文化也不会有正确的评价,学者中也难免缺乏对彝族文化遗产全面研讨,他们文章中不可避免的反映出一种偏见,把彝族的文化遗产认为都是迷信的经典,都是糟粕。这种流毒流传甚广。

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彝文有了新的发展，民族工作者在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普查调研中收集了不少彝族历史文献资料，由有关单位比较妥善的保管，因当时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国家主要精力用于普及教育，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还来不及进行大量收集、整理和研究，所以所收集到的这些历史文献基本上处在“冬眠”状态之中，后来在极左路线影响之下尤其在十年动乱中，把彝文经书当作毒草，甚至有的被焚毁、懂彝文经书的呗毫当作散布迷信的罪人被迫害，致使彝族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打倒四人帮后，国家民委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79年发出79（341号）文件，指出：“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有关科研、教学单位，都应根据自己的人力藏书条件，把整理研究彝族历史文献的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迅速付诸实施”。这次邀请云、贵、川三省精通彝文的经师集中于北京编纂北京地区彝文历史文献联合目录，重新翻译整理《彝文丛刊》就是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民族政策的硕果。

“目录”是在马学良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大家集体研究确定著录事项与编排体例的，首先由精通彝文的经师分别将每部书通读一遍，集体讨论它确实的“书名”。根据内容将六百五十九部分为十一个类别，即《历史书》（58部），《哲学书》（28部），《文艺书》（35部），《历算书》（43部），《作斋经》（91部），《作祭经》（211部），《指路经》（49部），《占卜书》（22部），《百解经》（70部）；《福禄书》（47部），其他的7部。在每类前均刊有从这一类书的实际内容和特点的研究，用汉文写出了“简明提要”，所以说这本目录既是具有对彝族文化一般知识性的介绍，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如果从头至尾将每一类的汉文“提要”阅读一遍，就会了解到彝族文化是多么

丰富多彩，它标志着彝族对祖国历史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呈现出彝族独特的风貌，记录着彝族同兄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交往。同时也会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必有其优点与缺点，决不可一叶障目以为书名以“经”命名，就盲目认为是迷信的东西，是“糟粕”，而应认真研究其本身记载的事实与内容。如“目录”中《指路经》一类“提要”中写的，《指路经》主要是教导死者如何走到远古祖宗住处和祖宗团聚，这是一种迷信的风俗仪式，但这里却含有古代彝族人民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古代彝族各支系的迁移路线，记载的山川地名，描绘出一副完整真实的古代彝族人民迁移图，可追溯彝族的来源，目录中这类文献书名相同，但因地区不同实际内容是不同的，四川彝族的《指路经》是指向东南；贵州彝族的《指路经》是指向西南；云南南部红河一带彝族的《指路经》是指向西北，三省的彝族《指路经》所追溯的方向却都指到“祖祖卜乌”这一地方。可见《指路经》对研究彝族迁移史是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这类文献对山川地理的描绘，一般是非常生动具体的，因此作为文学书来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看来有人说：“文化是人类调适于环境所产生的一种复杂体，用以表现生活方式，包括实物、知识、信仰、道德、艺术、法律、风俗以及其余在社会上学得与传递之能力与习惯。”是有道理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原则，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必须将各个民族的文化精华吸收到中华民族文化之中，并阻止不良文化之传播。但如何做到，必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认真进行社会调查与研究，正确评价，真正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能使中华民族文化更加光彩夺目。

“目录”著录内容是根据彝文文献的特点而定的，书名包括彝文书名、按彝文书名进行《国际音标》的意音和汉文译名；但无著者编者、年代，这是因为彝文典籍多为呗毫

代代传抄留世。增原书的出处一项，这从中了解那一个地区文化情况；还没有保存单位名称以及该单位的索取号，此书的破损情况，这对彝文研究工作者来说如购到目录便可了解到北京图书馆、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学院三个单位所藏的彝文典籍的全貌，进而查找所需的典籍。

另外“目录”最后附有云南省楚雄州禄劝县张兴老人的个人珍藏的彝文书目，共有一百二十二本。这是张兴老人家祖辈代代相传保存的彝文典籍，是传家之宝。张兴老人亲自编著。这一行动为进行彝族古典文献普查、编纂全国的彝文书目带了头，树立了榜样，应予表彰。

编纂彝文典籍目录是开创性的工作，彝文典籍又多为各地区呗毫传抄之因，文不规范，这三省的典籍文字差别较大。也是这次一定将三个省精通彝文的经师一块聚京共同协作进行编纂书目的原因。然而财力有限，来京的经师多为半百的老人其中两人已七十有余，生活不习惯，气候不适应。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紧张的工作，由于任务过重，时间短，故收录的这659部图书的成书年代，编著者或抄写者绝大多数都未予考证出来。从而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彝文古籍整理任务的艰巨。万事开头难，虽然这次没能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藏彝文典籍编到书目中来。但北京地区彝文典籍已普查清楚，我们深切希望有关单位再接再厉，克服种种困难尽快地使《北京地区的彝文典籍联合目录》早日问世。

近年来随着党的民族政策再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北京和各彝族地区先后恢复、建立了彝文编译研究机构，很多彝族经师应邀参加翻译整理彝族古典文献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翻译的《西南彝志》全书二十六卷，三十余万字，是一部彝文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内容涉及历史、哲学、科学、天文、工艺、宗教等方面；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发掘并翻译了明代的彝文医药书；四川凉山也发掘翻译了不少彝文经典。在彝文改革方面也取得进展，出版机构编印了彝文出版物，更可喜的是国家民委发出的抢救整理彝族历史文献的文件，得到了彝族人民的拥护，不少彝族老人将自己珍藏的文献经典亲手交给国家。如贵州彝族老人杨文光不顾七十三岁的高龄，背着他珍藏二百多年的彝文字典和记载着彝族历史的彝文典籍，步行三十多里还要转乘一段汽车，送书到有关部门献给国家。云南禄劝县一老人，一次就献出三百零一册彝文古籍，其中绝大部分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用毛笔书写的，有一小部分是木刻印本。这种可歌可颂的模范事迹不断涌现。从抢救收集文化遗产的角度这就要求我们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作要适应人民的思想，尽早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去收集彝族文献资料，使全国彝文典籍联合目录早日诞生，以供有关部门有系统地将彝文典籍翻译整理出来，使彝族文化这株瑰丽的花朵在中华民族的百花园中竞相开放，增添光彩。